

重新思考「歷史的想像」與 「歷史路徑的考察」： 評《強制移住》

林傳凱

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

《強制移住：臺灣高山民族的分與離》，葉高華著，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23 年 11 月，376 頁。

自 1983 年台灣原住民運動興起後，最初採取在都市影響政策與立法的「泛原住民族運動」路線。隨著時局變遷，2000 年後則逐漸轉向以「部落主義」為主的草根運動（阮俊達 2015）。此後，社區營造、部落地圖、耆老訪談、撰寫部落歷史等行動此起彼落。而當前對「部落會議」與「諮商同意權」的討論，更彰顯以「部落」為核心的運動成果。晚近的歷史書寫，也經常出現以部落為單位，同時強調以「自身記憶」取代「他者代言」的趨勢。

若上述軸線大致可信，葉高華的新書便是當前潮流下的一本「異色之作」。作者探索百年來未解的謎團：日本殖民為何、如何執行「集團移住」？而相關政策的後果又是什麼？然而，作者並未以大量的民族誌、口述訪談等當前「主流」的取材方法為取徑，而是以「殖民國家」留下的古老卷宗作為材料，不免讓人有「反其道而行」的感受。

本書探索的核心謎題是：集團移住的成因、過程、後果。作者並未積極與「純理論」對話，而是從先前探索此問題的經驗著作尋找切入點。他對於先前一些研究者採取的「政策一體化」觀點提出反駁，

台灣社會學第 46 期（2023 年 12 月）。

指出總督府的「移住」政策並非首尾一致，而在 1930 年存在關鍵轉折：先前是將原住民「集中」到警備道路或警察駐在所附近的模式，未必遠離傳統領域；此後卻採取將原住民「分開」並遠離傳統領域的移住平地模式（頁 5）。作者進而確定受影響的次序：最早是泰雅族（始自 1912 年）；接著是太魯閣族、布農族（1930 年代）；最後是排灣族與魯凱族。隨著日本戰敗，移住政策不再影響其他族群。

本書的架構便由此展開：第一章闡述研究對象、材料、方法和理論。第二章分析「霧社事件」與政策轉向的偶連性（contingency）。第三章檢視影響 1930 年代前／後移住與否的關鍵因素。隨後依序分析泰雅族（第四章）、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（第五章）、布農族（第六章）、排灣族與魯凱族（第七章）的移住過程，並探究對個別部落地緣與社會關係的影響。最後一章，對全書成果進行總結。

我認為能從「時間」的面向切入閱讀這本書。葉高華雖然是以「空間」為旨趣的地理學界出身，本書卻從對「時間」的思辨出發。因此我將閱讀分成兩個層次：首先是一階觀察（first order observation）或「對歷史想像的考察」，其次是二階觀察（second-order observation）或「對歷史路徑的考察」。簡單來說，前者探討行動者主觀中如何認知「時間」或「歷史」；後者則採取時遠時近的位置，一方面觀察行動者的主觀想像，一方面觀察行動者如何基於此想像而行動並招致預期之內／意料之外的後果，導致最終的歷史結局。其中，本書的觀點更貼近第二種視角。因此本文先討論該層次，再回頭探討本書對第一個層次的啟發。

本書以「二階觀察」分析「歷史」的貢獻

作者總結先前研究的兩大取徑：(1) 鉅觀取徑：關注國家政策背景與形成過程，而未考察政策對個別部落的影響；(2) 微觀取徑：關注部落空間與生活如何因此改變，對政策的考察卻相當鬆散。作者採取第三種途徑：中層視角（頁 30-32），不僅考察政策的成因與演變，也通過識別部落在地緣和社會網絡結構的位置，進而了解政策對

部落造成的關係變化，尤其是有無發生「分化」的後果。作者所稱「中層」路徑的設計，關鍵在於對「時間」在理論面的敏銳思考。

本書首先提醒了一個「社會學常識」，也就是「非意圖後果」的存在。這個雖然是大學課堂就可能提到的概念，但相關文獻中，卻處處存在「以意圖推果」或「以果推意圖」的解釋邏輯。作者引用 William H. Sewell Jr. 提出的「三種時間性」，批判先前研究常建立在「目的論時間性」（teleological temporality）的預設上：認定歷史有既定終點，甚至有深層法則，因此無論人們怎麼行動、發生什麼「表面上」的事件，都不會改變歷史終局。作者以矢內原忠雄在 1929 年的《帝國主義下の台湾》與松岡格在 2012 年的《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：マイノリティの 20 世紀》¹ 為例，前者的「資本主義化」與後者的「地方化」都認為無論發生什麼變故，不會改變結構性法則推向的命定結局（頁 36-39）。相對於此，作者採用的是事件時間性（eventful temporality），強調「歷史總是在不確定未來會遭遇什麼岔路的迷霧中摸索前進，經常不是按照事先繪製的路線圖一路暢行」（頁 7），存在許多「可能發生、也可能不會發生」的偶連性，偶連性甚至能影響全局，導致結局大相逕庭（頁 32-34）。因此作者並非否認「資本主義化」與「地方化」是影響原民社會的重要力量，但它們都「得需與其他因素競爭影響力，經由事件，某種力量可能被放大，也可能被壓制，導致時間異質的因果關係」（頁 38）。

第二章分析「霧社事件」與「移住政策」轉向的偶連性：在 1930 年以前的移住政策深受「森林計畫事業」影響，以在部落周圍保留每人約 3 公頃耕地為原則。只有當「保留地」面積不足才移住部分成員，進而導致「分化」效果（頁 40-51）。然而 1930 年後，將大批部落遷至平地成為主流——難道是為了預防類似「霧社事件」再起，而將「最危險」的部落移至平地管理？作者指出真正的偶連性

1 原作為 2012 年出版，2018 年出版中譯本，《「蕃地」統治與「山地」行政：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》。

在於：信奉「水稻至上論」的農務課人員岩城龜彥，恰恰在「霧社事件」爆發之初調職至理番科（調職是事件前決定的）。「霧社事件」後，總督府全面檢討「理番政策」，他便偶然參與新政策的制定，還把他「簡直把白米視為神聖之物崇拜」的信念帶進其中——他與同僚深信原住民吃了白米，就能體會「文明」之美，再也不會回歸「野蠻」（頁 52-60）。即使如此，政策最終無法規劃前行，因為山腳根本沒有足夠的水田可移住所有部落，實務上只能採取「移住平地」（積極目標）與舊有「現地保護開發主義」（積極目標）的折衷手段，只將部分部落移住平地（頁 65）。

第三章解釋：既然沒有全面移住，要如何選擇移住的「部分」部落？在全島 479 個部落中，只有 150 個部落被移住，其中關鍵為何？作者從史料找出最可能的六個變項，包括部落平均海拔、平均坡度、每戶水田面積、每戶旱作面積（都與水稻種植相關）、日語普及程度、對官方態度（都與順從程度相關），再經過迴歸分析後發現：平均坡度、每戶旱作面積才是關鍵。至於很多部落流傳的「順從度」並不具統計意義。作者進一步斷言：「總而言之，對統治者展現『好感』（無論是真心或虛情）並不能防止被移走。只要佔用太多陡峭的山坡地耕種，幾乎無可避免會被移走」（頁 73-98）。優先移住的考量，其實是發展水稻耕種的難易度，而「官僚最在意的是水田適地可以分配給幾戶、幾人，移居作業常以家戶或個人為單位進行計算，未能顧及社會網絡的完整性」，便能解釋為何許多部落會因「移住」導致舊有網絡中斷，最終產生「被分化」的主觀感受（頁 98）。

作者在第四到第七章，展現非凡的歷史技藝：描繪各「族群」下各部落在不同階段的地緣及社會網絡結構，指出「集團移住」對各部落的具體影響。這種驚人的成果，必須經過對龐大檔案逐一對照、勘誤、編碼、分析才能實現，讓人不禁想起他在「自序」的喟嘆——在每三個月被詢問一次「發表幾篇 I」的體制下，究竟有多少研究者能耐住冷嘲熱諷、取消新進獎勵的「懲罰」，用多年時間解答有關原住民社會何以至今的關鍵謎題？當然，面對如斯規模的歷史謎團，本書

仍有少數環節有待解釋：如作者指出泰雅族在 1912 年最先遭遇「移住」，而「1930 年代以前，『理番部門』可說在北部泰雅族身上花了最多力量」（頁 109-117）。但為何是泰雅族被優先針對？作者批判的「抗日最力說」在此案例有效嗎？或是其他機緣才導致泰雅族先被移住？本書並未明確解釋。即便如此，本書的成果，仍可想像是未來數十年，相關研究者已經無法繞開的「經典」了。

本書對「一階觀察」分析「歷史」的啟示

接下來，我想討論本書與「一階觀察」，亦即一些原民行動者提出的「歷史」的關係。本書很可能與許多當代部落建構的「遷徙敘事」相悖，甚至與耆宿口述相異。我們該怎麼看待這種差距？

雖然作者沒有明言，但本書隱含了一個方法上的質問：通過口述或田野去探索「歷史」的限度為何？例如，通過在各部落書寫民族誌或訪談，能否對這條貫穿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，提出與本書相似的一組解釋？我們能否在 2024 年的訪談中，指認出第二章「雙龜體制」的岩城龜彥、平澤龜一郎？（頁 54-59）或第三章提到「水稻至上論」在平均坡度、每戶旱作面積造成的影響？或是換個方式提問：當仰賴當代的民族誌、口述歷史描繪「過去」時，我們將獲得哪一種性質的歷史？

一些論點會說，地方社會很複雜，必須仰賴民族誌的全觀（holistic）才能釐清脈絡，但本書提醒我們：當代國家治理也很複雜，未必比部落生活更單純。包括國家龐雜的人事關係、部門角力、浩瀚的治理項目，都不見得比部落之內／之間的關係更單純。當兩者都形成一組同樣複雜，卻又難以相互觀察的社會空間時（遑論時間距離的阻隔），我們必須謹慎意識到，國家可能對部落有偏見，但部落對於國家也可能帶有諸多想像或臆測。

根本問題也許在於：怎麼評估人類「歷史記憶」的本質？「記憶」的形成都要經過人類的詮釋過程。一些研究告訴我們，人會把各種體驗選擇性地塑造為情節，再將情節編織為首尾連貫的敘事，最

後構成自我／集體認同（Polkinghorne 1988）。另一些研究也指出，即便是「想像」，對相信的人具有無庸置疑的效力，藉此定位人我、事、物、時、空之間的秩序，或成為凝聚「我群」與區分「他群」的關鍵（Hobsbawm and Ranger 1983）。更激進的立場上，一些研究指出不同人群認知「時間」的範疇各自不同，因此型塑的時間感、記憶機制、記憶內容也大相逕庭（黃應貴 1999）。

倘若這些判斷都為真，通過民族誌、田野、口述爬梳的「歷史想像」就有豐厚的社會與文化意義，能增進我們對行動者主觀世界的理解。這對「人」在生活中主動定位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關係，或是我群／他群的關連緊密相繫。同時，也使「人」在時間之流的體驗不同於空洞的「鐘錶時間」，賦予喜怒哀樂與道德意涵的豐饒質地。

即便如此，仍然要面對前述提問：當致力重建「部落史」或「地方史」時，通過一階觀察書寫「歷史」，究竟與本書通過二階觀察書寫的「歷史」有何異同？運用田野方法寫歷史，一定最能貼近地方、最避免受他者觀點扭曲嗎？人類學家 Stephan Feuchtwang 的經驗也許能帶來一些啟示。他在 1960 年代進入台北石碇展開田野，探索當地人對「地方」及「帝國」的歷史記憶或想像與生活的關係，進而出版 *The imperial metaphor: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* 這本經典（Feuchtwang 1992）。但一直要到 1990 年代，他才意識到進入田野之初，村落才經歷日後稱為「鹿窟事件」的大屠殺不到十年，但他在日復一日的田野觀察中卻毫無知覺（Feuchtwang 2009）。史學界在 1990 年代訪談「鹿窟事件」時，也出現各種分歧的當事者見證（張炎憲、高淑媛 1998）。近幾年公開的國家檔案，更記載與口述不盡相同的紀錄（薛月順 2020）。本書與這些例子都邀請我們思考：民族誌或田野方法的「全觀」在掌握「歷史」時的性質為何？限度為何？究竟與「一階觀察」或「二階觀察」的關係為何？

作者提醒許多原住民部落解釋「集團移住」的歷史想像，經常運用「抗日最力說」：自己的部落最勇於反抗，才遭國家分化的報復。這種說法放在當代，確實能為部落史增添風采，不過「追求歷史」的

旨趣若不僅僅在於強化認同，還抱持（相對）逼近「歷史真實」的渴望，那麼，「二階觀察」就有不可化約的重要價值，否則容易掉入 Bourdieu 所說自發社會學（spontaneous sociology）的陷阱：當事者說什麼，就直接當成社會學解釋，彷彿當事者有著不受社會結構影響的「清明」（Bourdieu 1991）。本書的啟示之一就在於提醒「撰史者」必須自覺：基於什麼旨趣寫歷史？書寫的又是哪一個層次的「歷史」？

這些問題，自然不可能在短短書評得到結論。我只想藉此指出本書在「二階觀察」的貢獻，以及對「一階觀察」的啟示。這對於歷史社會學也許是老生常談，但指出這一點，仍有助於更深入地體察作者在本書隱含的倫理關懷。

本書的深層關懷：另一種「解殖」與破除幻覺

本書以一種看似疏離「當事者觀點」的距離，藉此深化「解殖」的未竟志業。自解嚴後，「解殖」或對威權政體的批判，成為社會學界（或鄰近學科）的重要關懷。當前一種「批判國家」的路數，是不斷強調日本殖民、戰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強大而絕對，壓制被治理者的能動性，造成地方社會退縮與破碎。政權常以「大國家」現身：擁有算無遺漏的統治知識與執行技藝，始終遂行其意志。本書批判的松岡格《台灣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：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紀》一書就有這樣的色彩，松岡格想講述一個悲劇，原住民族自始至終被所有政權踐踏、裂解而「無可抵禦」的命運。

恰恰是這種看似站在原住民本位的觀點，抹除了歷史中原民行動者具備能動性的反抗軌跡，或國家力量有限而保存民間（部分）選擇空間的史實，進而將一個「實際上不曾存在的絕對國家幻覺」深植於意識。這種「讓受統治者想像自我最弱勢」的幻覺，究竟會幫助我們認識「真正的歷史」？抑或陷入另一種無窮盡的「自我貶抑」情懷？值得再三思索。

本書反覆解構「大國家」幻覺：一、強調統治者並非具有單一

意志的個人，政策包括各種意志折衝，歷經多個部門拉扯（頁 30-31, 240-241）；二、國家力量有時盡，許多決定倉促成形，不時失算，甚至缺乏付之實行的能力。因此考察國家的「計劃表章」與「執行狀況」經常出現「理想豐滿、現實骨感」的尷尬——雄心壯志的「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」最終執行率才略高於 10%（頁 248-250）。作者使用大量「國家書寫的檔案」，卻從看似雄壯的統治文書，瓦解後世不斷強化的「大國家」幻覺，提出重新思考歷史中原民行動者挑戰或閃躲治理的認識空間。

最終，在「重構主體」的旅程中，未必只有「當事者發聲」才是「最接近真相」或「最能突顯主體性」的路徑。實際上，每一種使敘說成為可能的認知框架，都可能受到特定結構條件的影響，涉及許多「外於我」的力量拉扯。本書指出部落流傳甚廣的「抗日最力而導致移住說」，很可能是鑲嵌於戰後國民黨政府「反日」或「中國民族主義」正當性下才誕生的產物（頁 241-242），這恰恰反映國家塑揉思想的痕跡，無助於認識部落「真正」的遷徙軌跡與成因，也無法彰顯「外於國家的主體性」。透過多重視角的考察，有助於掃除國家權力在自身視角隱而未現的「遮蔽」，因此即便是「局外人」的「二階觀察」，仍能夠為受壓迫史的重現作出一些貢獻——本書的貢獻便在於此。

參考文獻

- 阮俊達，2015，《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（1983-2014）》。台北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。
- 張炎憲、高淑媛，1998，《鹿窟事件調查研究》。台北縣：台北縣立文化中心。
- 黃應貴編，1999，《時間、歷史與記憶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- 薛月順編，2020，《鹿窟事件史料彙編》。台北：國史館。
- Bourdieu, Pierre. 1991. *The Craft of Sociology: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*. Edited by Beate Kraus,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. Berlin: Walter de Gruyter.
- Feuchtwang, Stephan. 1992. *The Imperial Metaphor: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*. London: Routledge

- . 2009. “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tic Loss: A Case Study from Taiwan.”
Pp. 229-250 in *Remembering Violence: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*, edited by Nicolas Argenti and Katharina Schramm.
London: Berghahn Books.
- Hobsbawm, Eric and Terence Ranger, eds. 1983. *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*. New York: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Polkinghorne, Donald. 1988. *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*. Albany:
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